

# “边际人”:多维文化世界里的挣扎<sup>①</sup>

——解读肖仁福小说的一种视角

龙其林

(广州大学 中文系,广东 广州 510006)

**摘 要:**肖仁福的小说坚持从边际人的视角出发,对处于新旧交替价值体系中的官场知识分子进行了集束性观照,将他们在社会剧变过程中的彷徨、失落和尴尬描绘得丰富而深刻。肖仁福小说中的“边际人”分为两类,一是表现从知识分子文化人格向官场文化人格转变但又尚未完成过渡的形象,一是表现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人物形象。

**关键词:**肖仁福小说;边际人;多维文化;官场知识分子

**中图分类号:**I207.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1)01-0014-04

## “Marginal Man” in Multi - Dimensional Culture in the World of Struggle

——Reading from Perspective of Xiao Renfu's Novels

LONG Qilin

(Department of Chinese,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Abstract:** Xiao Renfu's novels insist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arginal people and focused on the bureaucratic intellectuals in new and old transition value systems, which depicted their social upheaval and the embarrassment rich and profound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change. Xiao Renfu novel "marginal people" fall into two categories, one cultural personality of the performance from personality changes to the bureaucratic culture but not yet completed the transition of the image, the other performance of transition is from traditional to modern characters.

**Key words:** Xiao Renfu fiction; marginal people; multi - dimensional culture; bureaucratic intellectuals

肖仁福的很多官场小说中,例如《官运》《待遇》《闲人》《离任》《脸色》《心腹》《一票否决》《位置》等等,深刻表现了处于旧的价值体系尚未完全消弭、新的价值体系尚未重建完毕的文化转型中的官场知识分子的精神状况,将他们在社会剧变过程中的彷徨、失落和尴尬描绘得丰富而深刻。肖仁福小说对当代“边际人”的描写,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个是表现从知识分子文化人格向官场文化人格转变但又尚未完成过渡的形象,如《官运》《综合处长》《位置》等;另一个类型则是展现历时态的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人物,这又可以分为两个方面:

即由农村进入官场的知识分子系列和表现小农意识与现代启蒙精神冲突的系列。

文革结束后,中国内地的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在经济建设浪潮中不断得到确认和提升,愈来愈多的知识分子(来自农村或城市、边区或沿海)被吸纳到党政机关(或曰官场)中来,成为一类身份变动十分剧烈的群体。进入到官场中的一部分人,由于其原有的知识分子身份或长期的农业文化习惯,常常不能完全为官场体制或城市文化所接纳,或者在剧

<sup>①</sup> 收稿日期:2010-10-22

**作者简介:**龙其林(1981-),男,湖南祁东人,广州大学中文系教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20世纪中外文学比较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烈的时代变迁中找不到自己的身份认同,从而产生无穷无尽的沮丧和困惑。一边是处于官场场域制约、不断调整自己言行的权力机制,一边是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直面商业文化冲击,他们对社会的现代转型有着更直接、更切身的体会和思考。而正是这两个群体,成为当代小说中“边际人”产生的重要来源。所谓边际人,它是“指具有边际性的人格和社会心理的人。它可以划分为两种重要类型:一是指历时态的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中的‘过渡人’;二是指共时态的从一种文化世界走进另一文化世界但未完全融入该文化世界中的‘边缘人’”。<sup>[1]</sup>依据这种定义,我们可以看出时代转型是产生边际人的根本原因,正是由于时代与社会的巨大震动,才会加快传统向现代的转型速度,促使一种文化世界向另外一种文化世界的转移和融和。

由于特定时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我国内地很多地方的城市与农村之间鸿沟鲜明。为了寻找发展机会与理想的生活,众多的农村人们通过读书或做工的方式进入城市,形成了人数众多的人口迁移,这些人既承载着农业文化的长期熏陶,又必须接受都市文化的强烈冲击。是否产生了新型人格的群体我们姑且不论,有一个问题我们无法忽视,那就是农业文明的质朴、重义的观念与现代都市讲求效率、利益的观念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二者的碰撞在所难免。也由此,进入城市的知识分子必然对原有价值观念和新的价值观念进行重新选择、扬弃,在两难选择间游移不定,甚至内心产生剧烈分裂也实属必然。在进入都市的无数乡村出身的人中,有一类人最为引人瞩目,那就是历尽艰难跻身官场的知识分子。他们既十分典型地体现了传统知识分子身上的道统与士统间的文化矛盾,又十分典型地突显了进入都市的乡村人的价值观念的转变纠结,因此成为考察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渡人”的代表,成为最具内涵的边际人。在官场与都市的双重语境描述中,生活在城市又身处官场的乡村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人生遭际,便成为了富有文化寓意的选择。就肖仁福官场小说中知识分子的形象来看,出身乡村的知识分子在步入官场后必然面临三种不同的选择:或努力淡忘自己的出身,努力做一个都市人;或怀着不可抑制的渴望期待重回故乡;或久居都市而将对乡村的情感寄托在山水之间。

肖仁福的很多作品都表达了乡村知识分子跻身都市官场后艰苦奋斗的精神状态。《位置》中的沈天涯青少年时代生活在农村,直到18岁才考大学走出乡村,可以说他是在乡村文明和农业文化的濡

染中成长的知识分子。大学毕业后,沈天涯进入机关,凭借自己的才华和努力,担任了昌都市财政局预算处副处长的职位。虽然处于位显权重的重要岗位,但沈天涯依然保持着较为淳朴的为官本色,始终难以割舍乡村对自己的根本性影响。正像罗小扇所形容的:“乡村出身的人是幸运的,有根可寻,不像城里出身的人无根无基,没有故乡可言,总觉得漂浮在水面似的”。可以说,正是乡村文明的浸染,使沈天涯在财政局预算处的环境中始终保持着基本的做人原则,没有完全成为权力与金钱的奴隶。《心腹》中的杨登科出生于农村,后来成为了贵都市农业局的一名司机。为了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杨登科努力抑制自己乡下人的强烈自尊,努力在领导面前表现自己,以便获得重新开车、接近领导的机会。虽然杨登科不断地摒弃身上的乡土气,但他的精神根基始终与乡村联系在一起。“让杨登科一辈子也没法忘记的”,不仅“是村子和学校之间的那个山坳”、初恋情人邓桂花,更有那淳朴、自然的生活与人性,以及对乡村熟稔、亲切的记忆。在与战友猴子及其女儿侯竹青的交往中,杨登科的乡土记忆被激活,并对某些官员的蛮横、无赖有了更切身的痛感,由此唤醒了自身残存的民间重情重义的文化意识。因此,当出狱后的杨登科发现董局长不仅让自己作替罪羊锒铛入狱,而且还与自己的妻子鬼混,为人的尊严被彻底激发出来,凭借乡下人的执拗最终走上了告状之路。在这部小说中,除了杨登科之外,董志良作为一个同样来自乡村而完全离弃故土的知识分子,其自身的变异也富有深意。如果抛开职位、身份的差异而聚焦于文化背景,我们会发现杨登科与董志良其实有着某种相似性:他们都是由农村进入城市、进入官场。可以说,作家在这两个人身上赋予了自己对进入都市官场的知识分子不同态度的寓意:一种是如杨登科般依恋故乡,在乡土中重新找回了自己的精神根基与良知;另一种则如董志良般完全为都市、为官场所异化,成为失去了精神根基完全为权色所支配的官场怪胎。董志良自从苦读离开农村后,便一直在官场兜转,乡村的文化血脉逐渐地淡漠,都市的钢精水泥又无法扎根他的灵魂,于是他彻底地成为了没有精神血脉的孤魂野鬼,只能在都市、在官场中永远地流浪,异化为权力、金钱和色相的狂热追求。

来自乡土的知识分子们,跻身官场与都市,而又无法轻易摆脱文化母体给自己留下的心灵烙印,这就注定他们将永远徘徊在回家的漫漫长路上。即便无法真正接触乡村,故土也必然通过其它的方式来为这群人提供情感的、想象的心灵代偿。

## 二

上述历时态的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人物,还集中表现在小农意识与现代启蒙精神的冲突上。中国正处于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不容否认的是,由于自然经济和封建制度的长期存在,国民精神中小农意识根深蒂固,在农业人口仍然占多数的当前社会中,小农意识仍然有着非常巨大的潜在影响和制约作用。小农意识已进入官场文化的深层,成为千百年来中国官场污浊的酱缸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小农意识的非主体性表现在道德实践上的是标准的二重性。小农常以自我为圆心,以血缘、亲缘、地缘为半径把周围的人划分为面积不等的‘圈内人’与‘圈外人’。他们在对待‘圈内人’与‘圈外人’上奉行不同的甚至完全对立的道德准则,完全以是否有利于圈内人的利益为标准来判断评价自己和他人的行为善恶是非。在处理人际关系矛盾时,往往依据对方是否属于自己的‘圈子’而以情感代替理智,价值判断代替事实判断。小农为人讲人际、讲交情,为事讲关系。‘圈子意识’在现代社会直接导致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的盛行”。<sup>[1]</sup>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小农意识作为传统文化中负面因素的集中体现,已经长期潜在地控制着人们的头脑,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予以足够的重视。

肖仁福在官场小说中对小农意识这一中国传统文化的顽疾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他所有的官场作品几乎都涉及到了这一人们习焉不察的问题。肖仁福总是能够在官场生活的细节中捕捉到文化的因子,并将其生动地再现出来。在肖仁福几乎所有官场小说中,他都不遗余力地向我们揭示了以自我为中心、用血缘、亲缘和地缘等方式积聚官场势力的官场规则的影响,这就是小说中屡见不鲜的所谓“圈内人”与“圈外人”。《意图》中写到市委副书记魏德正时,曾有这样的议论:“在官场中多混得几年的人都有一个特点,到哪里都喜欢以自我为中心,尤其是几杯下肚,不管逢着什么,总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谁都得听他的”。此番说道,可谓是对官场中人这种“自我中心”的潜性思维方式的深刻揭露。卓小梅和罗家豪聊天时,说到魏德正似乎对宋老板有些爱理不理时,罗家豪这样解释:“这正好说明他们关系不一般。场面上亲亲热热,相反只是应酬,不是一家人。”这恰好反映了“圈里人”与“圈外人”的根本区别。小农意识中的非主体性价值观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权力崇拜,这在肖仁福的小说中更是俯拾皆是。例如《心腹》中的杨登科对待自己

的领导可谓是尽心尽力,甚至可以说是到了奴颜婢膝的程度,完全丧失了个人尊严的地步。另外,肖仁福对官场中不少领导存在的简单的经验思维方式多有揭示,这种思维方式的特征是不以逻辑、辨证、科学为起点,而是以粗糙的、表层的主观臆测为依据,这与党中央倡导的科学、民主决策有着根本性的差别。像《意图》中的魏德正之所以要强行拆除机关幼儿园,就是觉得将这块地方发展成商业用地,可以带动地方经济,为自己的政绩增光添彩。对这些官场弊病的警觉,使肖仁福的小说创作带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和反思意识,这也显示出一位有着鲜明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对此类社会实践问题的敏感。

除了历时态地凸显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边际人的身份、心理焦虑,肖仁福还在作品中生动地再现了官场中的不少知识分子由知识分子文化世界走进官场文化世界,但又难以完全融合的尴尬处境。这种文化世界边际人的出现,并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进入转型期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僵硬的政治体制得以宽松,文化自由与言论、出版自由也成为可能,这使得20世纪80年代曾出现了一个类似“五四”的启蒙和文化热潮。在这个热潮中,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批判意识和自由精神得到张扬,他们以天下为己任,苦苦地思索着一个民族走向现代的可能途径以及这个民族背负的精神枷锁。这是一个让人热血沸腾的时代,也是一个昙花一现的时代。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商业文化在中国呈现出压倒性的胜利,知识分子的精英理念、启蒙文化成为明日黄花。跻身官场之后的他们,在承受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念和世俗生活的冲击的同时,不得不接受官场文化的内在改造,处于一个精神极端焦虑而迷惘的状态。正是这个旧的价值体系突然倾塌、新的价值系统尚未建立之际,追怀昔日光辉岁月而看不到希望的知识分子们,在新旧时代的夹击下成为边际人。“从他们身上可以嗅到大动荡大变化中即将到来的新时代的气息,同时,他们又受到旧的时代生活的牵制,在他们身上可以捕捉到旧时代的残渣污迹。他们是‘生活在两个世界边缘’(高尔基语)的人物”。<sup>[2]</sup>肖仁福的很多官场小说都表现出了官场知识分子们身上官场文化与知识分子文化、市场文化与理想价值之间的冲突,将他们与现存官场文化、市场文化的摩擦与冲突描绘得栩栩如生。他们是一群在官场中找到了位置,但却找不到精神根基的零余者,他们试图努力寻觅而终于无所归依,从此变得忧郁、孤傲而漂泊不定、价值迷惘。

## 三

这些边际人既怀着对知识分子文化精神的天然喜爱,又有着身处时代、置身官场的身不由己,于是只能努力抑制自己身上文化心灵的觉醒,或是曲折、隐晦地表达着自己对知识分子价值观念的认同。“在传统社会里,人们的立身行事是根据宗教信仰、教义与宗教伦理原则作为判断取舍的根据。而世俗化就是人间化,人从对天国、神意的信仰迷信中摆脱出来,运用自己的心智,用最有利于达到实际效果的方式来谋求人间的幸福。”<sup>[3]</sup>在《综合处长》中,我们看到了陈东身处官场的不易。为了个人的事业与前途,他不得不周旋于局长怀海宝的身边,忍辱负重。但他内心深处又有着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与高贵底气,不愿为了个人前途而委屈了自己,恰如他所说“偶有文章娱小我,独无兴趣见大人”。最后因给古马中学违规贷款,陈东失去了自己的处长职位,却由此而获得了一种精神的满足和文化根性的觉醒。《位置》中的沈天涯,身处官场洁身自好,却也符合规则,接受各种灰色收入。看到木楠村祝村长因为修路而炸飞了自己的手臂,沈天涯身上的知识分子的精神气儿又被激发出来,他将自己和罗小扇的灰色收入16万元以财政的名义拿给了村里修路。《官运》中的高志强、《空转》中的何铁夫、《待遇》中的冯国富等,虽然身处官场而难以有更多个性色彩的自由表达,却通过亲近山水、书画、佛经而多少获得了心灵的慰藉,弥合了知识分子文化与官场文化、商业文化的裂痕。

即便如此,身处官场文化与商业文化夹击的当下处境,更多的知识分子发现已经难于寻觅自己栖身的精神家园,他们感痛于自己知识分子精神风貌的销蚀和个性的消泯、气质的钝化,不甘沉沦但在现实中又找不到出路,最后在灵与肉的纠缠中寄托自己无法找到的理想。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种等级伦理型文化,强调人身依附是它的一个基本特点;但中国文化业把忠君爱国、殉道明志当作至高无上的价值取向,因之也产生了强调独立不迁的人格操守的文化传统。”<sup>[4]</sup>肖仁福笔下的官场知识分子大多是新时期之后进入官场的中青年一代,既回荡着新的历史时代所赋予的美好理想与期盼,又畏惧于封建残余思想和现实环境的险恶,更由于没有形成自身坚定的价值或思想体系,而难以为自己找到化解心灵困境的钥匙,遂在现实与理想中不断地踟蹰。

由于暂时没有发现自身精神的前路,这些处于人生价值低谷中的官场知识分子,怀着伤感忧郁、

孤独彷徨的心境,在情爱中兜转,以消解心灵之中的那份无形的挤压。在肖仁福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官场知识分子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通过情爱来缓解心灵重荷的方式:《位置》中的沈天涯与叶君山是夫妻,但是他却通过与罗小扇的婚外情来舒展内心的苦闷与迷惘;《官运》中的高志强,身处市委副书记高位,既有着为老百姓谋福利的愿望,又不得不在现实利益面前奔突,欲居高位而不得的艰难处境使他在与妻子宁静、市妇联干部丛林、省组织部干部戴看兰的情感中驱遣心中的隐忧;《意图》中的卓小梅,在丈夫秦博文、老同学罗家豪及市委副书记魏德正之间往来,机关幼儿园的改制使得她焦头烂额,她与丈夫秦博文的感情日益淡漠,这个时候需要的便是一个能够为自己分忧和解困的人,罗家豪与魏德正担当了这样的角色。卓小梅在魏德正的卧室中曾经想通过“献身”的方式避免机关幼儿园的改制命运,其实从她个人的处境来看,这又何尝不是她个人情感的需要?这时的卓小梅需要的是一个富于魄力(实为权力),又能理解自己(官场处境)的人,她的内心必然有着通过肉体缓释精神压力的渴望。

肖仁福的小说十分形象地揭示了官场知识分子的精神处境:身处其中而无法获得灵魂的安妥。他们是社会转型时期变动不居的边际人,是传统价值解体而新的价值体系远未建立的特殊时期的官场精英。“经济体制的市场化直接导致了人们从生存方式到思想观念的急剧转型,进而从根本上撼动了整个社会的文化根柢。”<sup>[5]</sup>这个转型中的社会,造就了当代官场知识分子的特殊体验和尴尬处境。社会转型带来了生产力的提升、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的富饶,却不可避免地夹带了一种没有根基的精神痛苦,一种灵魂无法安妥的失落与孤独。

## 参考文献:

- [1] 王巨光.现代市民精神:“边际人”现代化的取向[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
- [2] 王德禄.论中俄文学史上的“多余人”形象[J].贵州社会科学,1991(4).
- [3] 张荣华.时代的中坚——我国现阶段的知识分子问题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71.
- [4] 田中阳.寸心[M].长沙:岳麓书院,2009:33.
- [5] 梁振华.宿命与承担——市场经济浪潮中人文知识分子的角色选择[M]//梁振华.枫林冷雨.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11-12.

责任编辑:黄声波